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大清锡伯营

拙木豪格 著

第一部

上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大清锡伯营

拙木豪格 著

第一部
上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5N03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锡伯营. 第1部: 全2册 / 拙木豪格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 5
ISBN 978-7-5613-8121-2

I. ①大… II. ①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383 号

DAQING XIBOYING

大清锡伯营(第一部)

拙木豪格 著

责任编辑	谢勇蝶
责任校对	王奉文 郑若萍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39.75
插 页	4
字 数	668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121-2
定 价	7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拙木豪格， 铁骑突出 (序)

周
涛

一、识人

古人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认为后一句没错，前一句却未必。善识人者，不必朝夕相处数载，只几面，便可略知其心志。识人者，观相，察气，掂举止，见脸后之心。观相——相貌俊丑虽殊，人品高下却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摒弃容貌偏见，可以立见心性。察气——气为命根，气质、气度、气派、气韵、气宇、气场，静辨其气，可知清浊。掂举止——一举手，一投足，粗看差不多，细看不一样，亲疏喜恶，皆在其间。见脸后之心——这一步最难，却也最关键，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者也。对拙木豪格这位二十年间只见了两面（据说三次，但我记得两次）的朋友，正是如此识之。其相如其名，拙木豪格头如木墩，方面阔耳大嘴，拙而豪。其气沉雄，其目坦白，其举止内检蓄力，言语不多，善饮酒，无失态之举，昭然已见脸后之心——必有大志存焉。

二十年间，无音讯，没声息，似从人间蒸发了。忽然来电求序，奇怪，竟没推辞，答应了。写的什么，没看；写得怎样，不知道。而且我印象中从没看到过他写

的东西，贸然应之，非我素日风格。我虽不爱为人作序，但二十年前的一面印象，隐隐识出此人必非凡器。书尚未看，已觉沉甸甸之力道。

二、见志

约了在大西迁酒店，请吃锡伯饭，各自带了三五良朋，会聚一堂。豪格斟酒致辞开场，说我接他电话第一句“这二十年你跑哪儿去了？”让他心暖了，感动了，捧出一大卷沉甸甸的一部53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清锡伯营》，说：“就是跑这里面去了。”这是第一部，还有第二、三部，总计130万字。从1764年锡伯人自盛京（沈阳）西迁伊犁河畔，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间跨越二百年，空间跨越北中国，朝代更替，风云变幻，数千部族，屯垦戍边，艰难困苦，情何以堪。我说：“锡伯就是鲜卑吧？音近。”“女真。”豪格说。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一族，拖家带小，万里迁徙，行期一年多，硬是从中国的鸡头走到鸡尾，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西迁长歌。

悲壮兮，绝唱矣。

我相信二百年间一代又一代伊犁河畔的锡伯人，口口相传，念念不忘乾隆年间的西迁往事，也不乏有志有心的人想为此立言，写出诗史存世。可是时过境迁，谁又能倒转时序复活人物再现历史？一句话，谁能奋笔回天？

创作一部像样的长篇小说已非易事，所耗心力才力不知等于跑了几个马拉松，绝非常人可堪胜任。但是和创作一部百万字的民族史诗比起来，其难度可以说小巫见大巫了。史诗要写出品格最难，既要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再现历史，又要求作者的一支笔变成孙悟空的金箍棒，大可擎天立地，细可做绣花针。

还是那句话，谁能奋笔回天？

三、史诗

拙木豪格，铁骑突出。

二百年等待，终于一出；锡伯族史诗，黄钟大吕。豪格说“孕育了至

少二十年”。过去一直是“铁马冰河入梦来”，对西迁往事扯不断，理还乱；现在终于是“铁骑突出刀枪鸣”，第一部53万字摆在眼前了。

全书浩浩荡荡如大河奔流，流的是正能量，流的是民族魂，流的是锡伯族人民二百年来的艰难岁月和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小民族，大气魄。锡伯族在新疆虽然只有几万人，但他们自尊自立自强的品格有目共睹，他们的爱国之心赤诚火热，他们用刚强、执着、坚韧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百年戍边史诗！他们以自己民族的命运为整个中华民族树立了一个典型——不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崇高典型，他们值得全中国各个民族学习效法！

全书人物众多，情节环环相扣，跌宕起伏，一旦展卷阅读，便让人欲罢不能。小说大骨骼、大脉络，众多人物形象鲜明，性格饱满，而又笼罩在整体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氛围之中。色彩既热烈又冷艳，笔触既刚猛又内敛，直如黑龙江冰河翻滚倾泻流入伊犁河茫茫水域……从女真人森林狩猎，草原游牧，到锡伯人耕牧兵屯，一个民族的生存史、成长史历历在目，这难道还不是史诗吗？可以断言，若不是久浸民族文化环境的锡伯人，绝不可能写出大西迁之史诗；而不具备更大的文化视野和文学把握力，也不可能表现得如此雄浑有力。

“胸中万象火铸就，笔底千秋血染成。”史诗就是这样诞生的吧，我想。

四、弓马

席间，豪格送给我一份礼物，是感谢我答应为他作序吧。什么礼物？厚礼。一张硬弓，七支长箭，齐整地插在一个纯牛皮的箭套里。制作精美，令人心动。“这是送给我的吗？”“对，送给你的。”我说：“此礼甚得吾心啊，若在那个年代，我也一定是弓马娴熟啦！”我知道豪格此举发乎心性，体现了锡伯人对文化的尊重。恰恰是这样一个弓马世袭、刚猛彪悍的尚武民族，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有着敬神一般的虔诚……对比之

下，难免不令人心生感慨。我们这个讲究诗书传家的民族，现在崇拜金钱，嘲笑诗书，藐视文人，看看人家，无地自容啊。

赠我强弓长箭，干什么？射天狼啊。而今什么是天狼？当然是强国强军梦啊。强国强军，势在必行，十三亿之国，岂容沉沦！当今世界，强则生存，弱则淘汰；古老民族，必须复兴。复兴靠什么？仍然要靠长箭强弓。十三亿支长箭，坚强领导核心是强弓。箭无弓不飞鸣，弓无箭不中的，弓箭合力同心，方能射出锦绣前程。拙木豪格的礼物，也是锡伯人的一片心愿，他们的国家观念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的崛起之心是十分迫切的，他们懂得只有中华民族复兴，锡伯人才有希望。

五、此书

此书不是一般的书。

据说全国每年有几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想来哪一部也不是随便出的，都是作者苦心经营之作。但是像这样的大作、长卷、史诗，恐怕仍是罕见。

此书可以称得起那几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若是没有拙木豪格这个有心人写伤心事，再悲壮的大西迁事件也只能渐渐淡化，成为锡伯族的一个心结、历史资料中的一块化石。只有伟大的文学能让历史复活！这正是文学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放在一起，超过了任何宗教典籍，而且更大地影响了人类心灵，再造了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

此书正是一种这样的努力，它的问世和出版，至少是完美地填补了一个民族长达二百年的缺憾。

拙木豪格，铁骑突出。

是为序。

2014.3.28

（周涛，新疆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著名散文家，诗人。）

五十而知天命

《大清锡伯营》自序

拙木豪格

人过五十，蓦然回首方能领悟天命是怎么回事。说白了，今生托生为人，上天只安排你做一件事，做好了，功德圆满，不枉此生，做不好或是根本没找准要做什么事，升天之日，无法交差。

为锡伯部族非凡的过去写一部史诗存世，是我青年时代就立下的人生规划。五十岁之前，除了上学、读书、交友、喝酒，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为生计而奔波的工作上。表面上看，和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也在凭性情不断制造喜悦和痛苦，享受着富于戏剧式波折的生活情趣。直到五十岁那年，当被告知因为企业改制面临失业的时候，生活突然像正在惯性行驶的列车脱轨颠覆。尽管我明白这是一群人品着茶在不露杀机的谈笑风生中行使手中生杀予夺大权的结果，我和另一群人不幸成了他们红案上被剥着玩的鱼肉，但也算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命运的裁决。真的，我没有任何抱怨，冥冥中反倒觉得这是上苍对我人生的强力干预，不然，我会无休止地忙忙碌碌做无用功，最终忘却今生背负的天命，那岂不有违天意？

小说的创作由此被推上案头，占据了自此往后的大部分时光。

锡伯部族西迁伊犁屯垦戍边已经二百五十年，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被置于八座彼此关联又相对封闭的酒坛似的城堡里，天长日久，开始散发浓郁醇厚的曲香，撩人心肺，意味深长。锡伯部族的西迁作为一次国家行为，一个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伦理主题，在以往乃至当下一直是媒体关注和推介的历史事件，但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努力仅限于事件本身和由此引申出的标题式的西迁精神，而更多耐人寻味的人文景象却被忽视，至少未能被足够多的人群所认知，所领略。

我要讲的，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故事，是按照逻辑推演应该发生的故事，是遵循文化积淀的法则自然流露的人性奇观。

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岁月里，随着个人阅历的不断积累和思想日益趋于成熟，我对西迁这一历史事件以及锡伯族屯垦戍边二百多年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升华。我渐渐觉得，西迁不单单是一次贴着爱国主义标签的军事行动，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西迁之于锡伯族，首先是一次文化断裂，也就是种族传承的大部分文化积淀都被遗留在了东北老家，这就意味着摆在西迁锡伯族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文化重建。所以我认为，锡伯族西迁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重建的历史，其间涌现的诸多代表性人物和发生的代表性事件既是锡伯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延续，又是激情澎湃的文化探险与创造。因此，我更关注西迁锡伯族在这一过程中真实的生存状态。

写一部年代跨度近二百年的史诗性作品谈何容易！为此，我曾在苦恼、彷徨、焦灼中等待了二十年。等待什么呢？我隐隐感觉到生命中会有一次接受神谕的机会，那将是灵感井喷的神奇时刻。这个时刻在一次不经意的聊天中终于降临，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水、火、光的影像，这便是作品的叙事结构。它帮我理清了纷乱的思绪，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二百年历史长河的三个特殊时期，那正是锡伯族文化重建的三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即小说第一部所反映的锡伯营初创时期——西迁征程与开挖大渠（与水有关），从1764年到1812年，时间跨度约五十年。它是最初的源与流，是屯垦戍边伟大使命的完美契合，是文化重建过程中的第一次全民觉醒。第二部所反映的“同治之乱”时期（与火有关），从1864年的“库车事件”到1881年清廷收复伊犁。这个时期锡伯部族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次大劫难，

以区区一万多人的弱小身躯阻挡住了几近灭顶的狂涛巨澜，其中所反映出的极度忍耐力、危难承受力、民族凝聚力以及核心群体的政治智慧与牺牲精神都彰显出强烈的民族个性与非凡境界。第三部反映20世纪前半叶锡伯营面临的大变革时期——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与光有关），这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蜕变过程。关注大变革时期的社会转型及其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是能够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种理性选择，这个时期呈现给我们的是激情与堕落并存、理性与荒诞混杂、光明与黑暗相间、进步与复辟争锋的乱世景象，光明隐约显现，如影浮动。阅读这段历史，你会惊异于一个弱小群体身处礼崩乐坏的危势中最终完成自我修复的坚定信念和强悍力量。

本书是总题为《大清锡伯营》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内容主要是两个事件，即奉诏西迁与开挖大渠。这两个事件前后只相隔三十多年，且内在关联十分紧密，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西迁是源，开渠是流，西迁精神由此源远流长。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中，一位朋友曾经不无沮丧地说过这样一件事，几年前他陪同一个因为感佩锡伯族西迁壮举而访问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内地学者去看察布查尔布哈（大渠），在渠边站了一会儿，学者失望地叹道：“不就是一条渠嘛！”我们没有理由责备这种肤浅、无知甚至冷漠的见解，因为他的满腹经纶跟这条渠没有关联，他缺少的不仅仅是真诚的体验和感悟，还缺少最起码的礼仪范畴的宽容态度。说实在的，与波澜壮阔的大西迁相比，对察布查尔布哈持有这种肤浅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至少在他们看来，西迁所体现的层面是皇命国策，所彰显的意义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所铺陈的底色是雄浑、悲壮和大美，区区一条渠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

但有人不这么认为。一条渠流淌了二百年，不仅创造了数以万亿计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淌出了一个部族壮丽的生命史、文化史和奋斗史。察布查尔布哈作为植根在锡伯部族心中难以磨灭的文化符号，已经升华为无所不包的精神图腾。西迁征程虽为千古绝唱，但毕竟是一次被动的种族迁徙。开挖大渠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出击，在当时大清所有边防旗营中独树一帜，不仅强化了锡伯部族的家园意识，也对固化国家版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是一本思想启示录，向人们说明锡伯部族对高尚生命的建筑

能力；它是一盘惊心动魄的棋局，是锡伯部族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生存背景的大转换。安居乐业说起来是个轻松的字眼，但对经历过离散颠簸，在无根无基的焦虑中备受煎熬的锡伯部族来讲则是再实惠不过了，这种实惠又是靠全民族超常的努力和创造才获得的。有了察布查尔渠水的哺育，锡伯部族原已虚弱的躯体便得以康复，他们的生命姿态便永远保持着坚挺向上的力度，可以沐浴更多的阳光，可以承受几近亡族的灾难。

锡伯部族的文化重建正是以开挖大渠为滥觞，拉开了不同凡响的序幕，并赋予它以水的体量、水的坚韧、水的智慧和水的谦逊，静若平湖，不事张扬，动若狂澜，惊杀鬼神。《大清锡伯营》最初的立意基于此，所以用足够的篇幅和足够的激情对开挖大渠这一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势在必然。

作品中设置了一个以锡伯爱曼（部族）乌拉本（传奇）为叙事主体的隐性结构，并将这一结构贯穿作品始终，它是我对一些口口相传的零星传说和锡伯部族原始记忆的诗性想象与技术链接的产物，是对扑朔迷离的部族渊源以及如影随形的神秘意识的文化解释与逻辑推演。其中，关于部族渊源的描述与当前业已形成主流的“鲜卑说”观点严重分歧，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和另一些人的迷惑，这是可以想见的情景。

关于族源问题，我将在一部题为《锡伯族历史文化解读》的专著中用一个章节的篇幅展开详尽而有说服力的论述，在此恕不赘言，只给出提纲式的逻辑线索供读者参考。

认祖归宗是一件大事，容不得半点将就的态度，所以我一直格外执拗，原因是“鲜卑说”无法令我信服，它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鲜卑说”从学术假说升格为当前难以颠覆的主导性结论，首先是因为政治的干预，是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产物，其次也和媒体的盲目炒作有关。

“鲜卑说”无法说清从鲜卑消亡到锡伯见史这一千多年的历史空白和部族流变，它给出的线索“鲜卑—室韦—席伯—锡伯”在半道上就将我们引向另一个民族——蒙古族，因为史学界已有定论，室韦是构成蒙古族的主体人群。再说了，室韦和鲜卑是同时代的两个部族，并无传承关系。

我们先看看鲜卑人从兴起、发展到消亡的过程。

从秦末汉初到北魏解体，鲜卑人不断分化，最终像一把盐溶于水中般稀释消亡：楚汉相争时，蒙古高原东部自不量力的鲜卑招惹匈奴，结果被冒顿（mò dú）单于击败，退守鲜卑山和乌桓山，分化为鲜卑和乌桓二族。公元1世纪，匈奴分裂形成南北两支，南支附汉，北支西迁，鲜卑乘机涌入蒙古高原“尽得匈奴故地”。在征服遗留于此的“十万落”匈奴人和突厥人祖先高车部落并与之融合后，鲜卑又分化为柔然、拓跋鲜卑和铁弗匈奴。《魏书》第九十五卷《铁弗刘虎传》中说：“北人谓胡（匈奴）父鲜卑母为铁弗。”当代学者马长寿先生经考证在其《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进一步提出“鲜卑父胡（匈奴）母所生之子孙”曰拓跋鲜卑的观点。勒内·格鲁塞在其巨著《草原帝国》中直接把拓跋写成“突厥拓跋”，这说明这个时期的鲜卑人已经完成了突厥化的进程。公元2世纪中叶，以鲜卑首领檀石槐为联盟长的拓跋、慕容、宇文部落联盟形成，其疆界纵横上万里，并与中原对峙。

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各王雇佣相邻的强悍游牧部族作为其逐鹿中原的生力军。结果，羯、氐、乌桓、拓跋、宇文、铁弗等相继涌入中原裂土称王，西晋王室南渡长江退守半壁，这一时期即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拓跋、慕容、宇文等鲜卑部族先后在北部中国建立前燕、代国、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及北魏等国，其中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大魏（史称北魏）政权存续时间最长，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也最大。

北魏经历六镇之乱后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后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篡位自立，北魏一脉正式消亡，而漠北的柔然汗国也已于公元555年被突厥汗国所灭。此后鲜卑人绝大部分融入中原汉族，其余部分融入突厥和室韦（注意，并不是改称“室韦”），作为主体部族已不复存在。

从上述鲜卑部族迁徙流变的过程来看，走出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在向西向南拓展的同时，与当地其他部族不断融合，致使内部不断分化出新的种族群体，其血统中吸纳了汉、匈奴、突厥、羌、羯、氐等民族的基因，自身元素不断被稀释，以北魏消亡为标志最终融入其他种族群体，告别了历史舞台。

所以武断地认定“锡伯乃鲜卑遗民”没有史实根据，在理论上是站不

住脚的，因为隋唐以降，鲜卑已经销声匿迹，再没有以一个主体民族的状态向下延续繁衍，而是像一把盐撒进其他乘势兴起的民族洪流中，彻底溶解了。

如果按“鲜卑说”的另一观点，说锡伯族是当年鲜卑西迁时留在祖地守庙部落之裔，那更是荒诞不经的猜想。从鲜卑人走出大山称霸塞北入主中原再到九部大战锡伯见史，时间跨越至少一千五百多年，在王朝更迭、部落征战、民族融合的激流冲击下，一个弱小群体如何能保证自己长期坚守故地而不挪窝？又如何抵挡得住在其聚居地游来荡去的强势部族对其分解同化的必然命运？《魏书·礼志》中记载了关于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石室（即嘎仙洞）告祭的事情，缘起乌洛侯遣使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魏书·乌洛侯传》）。两处文字均未提及石室有人守护的事，乌洛侯使者说那是一处“旧墟”，说明废弃已久，只是个石洞而已。可以试想，如果真有一支所谓的鲜卑人祖先留下的守庙部队，那他们的亲人都已经入主中原建国称帝好几代了，怎么不去京城向主子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顺便讨个官职什么的？

音近视同、望文生义是历代中原史官学者研究并描述边地少数民族的一个通用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它能够为我们揭示关于部族流变的线索和事实，但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者引入歧途。理由很简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不能孤立使用，考察和判定一个部族的流变轨迹更重要的是史实证据的连接，缺少任何一环都不能妄下断语。这样一种轻率的治学态度一直延续至今，仍在制造荒谬，竟有人论证说法国总统萨科齐祖上为匈牙利望族，源于鲜卑与其音近的一个氏族，所以和锡伯人有血缘关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就算萨科齐是阿提拉的子孙，那他跟鲜卑又有什么关系？阿提拉是鲜卑涌入蒙古高原前已离开此地的北匈奴郅支的后裔，跟鲜卑根本就不搭界，又何来血缘传承？

那么，锡伯部族是从哪儿来的？锡伯部族的太庙里应该供奉谁？

我们先看看什么是锡伯部族最远古的遗留，这将是解开部族渊源密码的第一把钥匙。

海尔堪玛法（Harkan mafa）和喜利妈妈（Siren mama）被公认是锡伯部族的男女始祖，前者主司六畜兴旺繁衍，而后者主司人丁兴旺繁衍，是

原始人群最基本最直接的愿望表达，具有图腾的文化特质，他们应该是锡伯部族延续传承最久远最古老的种族记忆。Harkan mafa和Siren mama是女真语（即满语）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意义确定，具有排他性和字义与功能的完全一致性。harkan意为“悬挂的神龛”，mafa意为“祖宗（多指男性）”；siren意为“藤子、瓜藤和脉、脉络”的意思，而它的动词形式sirenembi便是“接连不断，连绵不断”的意思，mama意为“祖宗（专指女性）”。

我们知道，鲜卑语与女真语虽然同属阿尔泰语系，却分属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某些词汇有通用现象，但不可能在构词法及语义逻辑方面出现完全一致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就此断言，harkan mafa和siren mama是女真语而不是鲜卑语。接下来问题就产生了，如果锡伯族是鲜卑人的后裔，那锡伯族的远祖们为什么会用女真语来命名自己的神灵（图腾）？谁能解释这个问题并令我信服？

我们还知道，满语是女真语的传承与发展，而锡伯语与满语就是同一种语言，锡伯文字也来自满族文字，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在1947年实施的那次文字改革^①以前，锡伯部族自己也称自己说的是满语，使用的是满文。二百五十年前的西迁，使生活在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因为居住绝对集中和环境相对封闭，非常完整地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保留了下来，并在与周边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它。我想，有人强调所谓的差异，是在拿现代锡伯语和二百五十年前文献档案中的满语做比较，这未免有点迂腐了。差异的形成，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锡伯族所使用的满语（女真语）是活的、动态的、发展的，而躺在文献中的满语则是死的、静态的、停滞的。当然，作为女真集团的不同部落，因为迁徙流变的情形各异，在语言方面存在细小差别也是在所难免的。

下面说说锡伯族的姓氏。

姓氏是能够说明一个部族绵延脉络的最稳定可靠也最显性的文化符号，一般情况下，一个氏族单元不会轻易改换自己的姓氏，像帝王赐姓或

^①1947年，萨拉春等一批锡伯族知识分子对原来使用的满文进行了大胆改革，废去一些音节，增加了几个锡伯语新字母，创制了经由满文发展而来的锡伯文字。

因一些特殊理由而另立门户的是极其个别的现象。据资料显示，锡伯族现有姓氏148个，其中有瓜尔佳、富察、温都尔、阿尔班、完颜、那拉、吴雅、何舍里、石佳、鄂托等十几个姓氏来自《金史》中记载的女真旧姓，比例高达9%。《八旗满洲姓氏通谱》一书载有除爱新觉罗外的姓氏1119个，锡伯族现有姓氏中有近70个列入其中，比例接近50%。另外50%则大都属于锡伯部族原有姓氏和不断从一些姓氏中分化出来另立家谱的姓氏，只有极少一部分姓氏据考证可能来自契丹、蒙古等部族。由此可以推断，锡伯部族作为女真集团的一个部落群体，通过紧密的姓氏血缘关系在上千年的沧桑岁月中一直维系繁衍下来，并很好地保护和发展了自己的文明果实。

家谱和氏族宗谱作为姓氏文化的文本形态，是我们考察研究一个部族迁徙流变过程的可靠依据。近年来，东北一些专家学者在对满族、锡伯族家谱文本进行挖掘、搜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为我们弄清锡伯族源这一问题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线索。

“锡伯”这一族称始见于记述清初九部大战这一事件的《太祖实录》，锡伯部当时与卦尔察等部隶属科尔沁蒙古，其活动范围大约在大兴安岭南端东麓的绰尔河及洮儿河流域，此地现存锡伯绰尔城及锡伯故城等遗迹。这里河流纵横，青山绵延，恰好促成了锡伯部族渔猎文化的孕育和发展。那么，既然锡伯部族是女真（即满洲）集团中的一员，怎么又成了科尔沁蒙古的部属了呢？正是东北学者们的族谱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八旗满洲姓氏通谱》《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以及大连发现的超墨尔根（人名，瓜尔佳氏）后裔锡伯族关氏谱书等文献中都记述了发生在明洪武年间的同一件事：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地方，其先有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奇，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奇迁西伯，珠察先迁瓦尔喀再迁希昂阿济哈渡口，后珠察子又率部迁回苏完居住。明万历年间领十个儿子五百户族人归顺努尔哈赤的苏完锡伯部首领索尔果就是珠察第六代孙。索尔果之子费英东是清初五大臣之一，而索尔果的孙子鳌拜则为康熙朝辅政大臣。

“苏完”一词的满文拼写形式为“suwayan”，满语意思为黄色，汉译

苏完、苏瓦颜、苏阿颜、刷颜和双阳等，所指之地即今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苏完为一高岗，即文献中所说“suwayan hada”，因土质呈黄色，故名。

上述宗谱中记录的这件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几个信息：

满族瓜尔佳姓氏与锡伯瓜尔佳姓氏同根同祖，均出苏完地方。而瓜尔佳姓氏历来为满洲和锡伯第一大姓。

“西伯”即锡伯，原系地名。锡伯部应为尼雅哈奇一支迁此后以地名自称或他人以地名称呼该地部族而得名。或者，他们仍继续延用锡伯国名为部名。（其实，“gurun”一词既可译为“国”，也可译为“部”或“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长兄佛尔和与三弟珠察的后裔在清初即加入了满洲，成为今天满族的成员，而尼雅哈奇一支所迁锡伯地方迁入科尔沁蒙古领地，最终成为隶属科尔沁蒙古的部族，不过仍保持相对独立性，并拥有自己的王或汗。尼雅哈奇及部属的后裔直至清康熙朝才被赎出，编入八旗。被同时从科尔沁蒙古赎出的还有卦尔察（瓜尔佳）部，他们也应该是尼雅哈奇一支的后裔，并保持以姓氏为部名。

另据文献记载，金朝被元朝灭亡前夕，女真贵族蒲鲜万奴建立东真国（亦称东夏国），后在蒙古强大压力下被迫归附称臣。蒙军主力南下，蒲鲜万奴乘机反叛，结果被灭。1237年，东真国旧将超墨尔根在苏完地方自立为锡伯国（sibe gurun）汗，并向蒙古称臣，成为元朝地方藩属。1368年元朝灭亡，锡伯国失去靠山，其第五代国王于1415年被其女婿纳齐布鲁（那拉氏）所逐，锡伯国就此灭亡。稍前，就已发生了三王子因翎争而斗气离居的事。

1410年至1428年之间，纳齐布鲁在呼拉温河自立为汗，国号“扈伦”。1429年南迁至吉林乌拉城建都，并受明朝册封世袭塔山卫都督，史称“海西扈伦国”。明朝末年分裂为乌拉、哈达两部，又为辉发、叶赫所侵，并称“扈伦四部”。

清崇德帝皇太极有两次说到锡伯部族的言论见诸文献，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都兴智在《锡伯族源出女真论》一文中论述道：“《满洲源流考》记清太宗称‘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而《东华录·天聪十》（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中又记载天聪九年十月庚寅日曰：“我国原

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无知之人称为诸申^①。诸申乃席北超墨勒根之裔，与我国无涉。今后，一切人等，止许称我国满洲原名。”

这两段话是皇太极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说的，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皇太极于1626年继汗位，十年后的1636年称帝，定国号为大清(daiqing)，并将族称女真(zhusen)改为满洲(manzhu)。第一段话是在继位后不久说的，其用意是安抚同为女真但隶属科尔沁蒙古的锡伯部众，为将来能够顺利招徕这部分部众扩充兵源做舆论铺垫。而第二段话则是在他称帝前一年说的，此时的皇太极已是雄心勃勃，开始为将来入关征明、问鼎中原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上的准备。考虑到“金”“女真”等称谓因历史原因在汉族民众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决定改国号为大清，易族称为满洲，所以才会气急败坏地斥责那些仍以女真自称的臣属，并不无勉强地将新兴的满洲共同体（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部分野人女真）与女真割裂开来，这其实是特殊时期的政治需要，是皇太极整个战略构想中的一部分。看来博学精明的皇太极很清楚锡伯部族的脉流渊源，知道他们是完颜女真的直系后裔，因而将“女真”这一称谓只限定在锡伯部族范围，其用心可谓良苦。

到了康熙朝，沙俄向东扩张的步伐加大，并在黑龙江北岸筑雅克萨城，对大清国形成军事压力。另外，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此时亦起兵叛清并东征，迫使喀尔喀蒙古大量难民涌入嫩江流域，一时秩序大乱。朝廷苦于兵力有限，军事调遣捉襟见肘，既不能充实边防，又难以维持地方稳定，于是想起隶属科尔沁蒙古的锡伯、卦尔察及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部族）等可以为朝廷所用的兵源，便启动了以重金赎出他们的程序。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委托在蒙古部众中有深远影响的乃济托音二世活佛亲往科尔沁部斡旋，并嘱咐说：“（科尔沁）那里有我们满洲人锡伯、卦尔察部落，务使其归朝为我所用。”最终，赎出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部众共14458人，除老幼外，可披甲者11850余丁，分别编成84个牛录（清朝军政合一的组织），归属八旗满洲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

从文献中记载的锡伯部族活动区域即嫩江支流绰尔河与洮儿河流域来

^①诸申，即女真。